

4000 年前的中华语音、文字一次大合璧

杨伟国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摘要：

笔者主要研究信息哲学问题，多年的业余天文观察和爱好，无意间窥探了古夏民族的天文知识与语音的一些奥秘：知悉 4,000 年前中华远祖的主流夏语言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音一义的“汉”语言，更接近于拼音方式，学者称之为“胶着语”。形象鲜明的夏字符如何完整地被殷民族接受，再与本民族的一音一义殷语言的整合，可誉为一次东方的文化大合璧。形成了日后世界上“一音一字一义”极为独特的方块汉字语言。这是东方华夏文化的重要根基。有关中华文化的这一语文的重大改变过程，没有被学术界更详细地研究过。

关键词：

方块汉字 多音语言 一音一义 复脑文字 语言化石

世界语言研究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语言发展的谱系和语言的结构方式。若从世界语言结构来看，则可分为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三种主要类型。多数民族在发展文字形式时，都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原始文字中的形象信息，一步一步走向了表音、屈折型言语。

唯独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来一直使用了一种非拼音的汉字，语言学者称之为“孤立语”或者“词根语”。使用一音一义的方块汉字及其衍生语言主要是在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被学者称为汉文化圈，或者称为汉字文化圈。

当人类发展了语音和语法，人类的整个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创造了地球新文明。在发展语音、语法和创造了表音文字之际，音符与语义的明显分离而创造出元音和辅音，语法 SVO(主动谓)更是蕴含了对事物时序的把握。人类把使语法进一步发展出其他规则：VSO(动主谓)或者 SOV(主谓动)等等，人类的大脑理解功能和表达功能更加显著地分工。

1. 方块汉字是复脑文字——左、右脑叶均有汉字的认知能力

中华大地使用了数千年的方块汉字，究竟在人类历史中有何价值？

亚洲中的日本是最早起步追随西方文化、学习欧美最快的国家，她在亚洲中亦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现代科学和临床医学等都能紧追西方的发展。日本是兼用假名(拼音文字)和汉字双文字系统，在研究汉字和假名在脑功能关系上，日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天然条件。在 1974-1989 年间，日本神经科学家证实：日本人大脑左半球对汉字和假名均有认知作用；大脑右半球则几乎没有对假名的认知作用。

中国学者(郭可教, 1985, 17-24 页)引用美国学者罗津(P. Rozin)以汉字字卡去医治西方儿童的“阅读不能症”，认为需要重视中国汉字的大脑不同认知方式。通过多年的科学实验，证实日本假名和西方拼音文字一样，都是偏向大脑左半球的“单脑文字”(郭可教, 1992, 42 页)，日本汉字和中国汉字则与大脑左、右均有关系的“复脑文字”(高定国 等, 1993, 363-368 页)(郭可教 等, 1995, 78-83 页)。因各种原因而切除一侧大脑的病人，在分析东方汉字用户与其他拼音文字用户之间的差异，残留的单侧大脑在文字认知功能上有着极明显的不同。

应用汉字的华夏后人是否天生的左、右两页大脑同时并行使用？

不。我们七、八岁未认真识字前，也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一样的左、右两页大脑明显分工的。华南师范大学的学者研究多年的结果(许世彤 等, 1992)：应用拼音文字的人群(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和西藏藏族居民——他们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拼音文字)，两页大脑是明显的分工、各有不同的优势。只要他们(包括来华任教的外籍教授)愿意学习汉字——不是单单只说汉语(口语)，约五年之后，思维过程竟会逐步走向两页均衡并行使用。

1996 年日本东京电机大学和日本电话公司公报了多年的合作研究结果(香港《文汇报》，1996)：象形汉字与日本字符(假名)在日本人群的大脑反应速度，竟是 0.1 秒和 0.3 秒之比！主持研究的小谷诚教授解释了实验结果：人们认识拼音字符需要三个过程，从光学画面图案接收字符信息后，要先在左脑判断确认，把图形转读为音节，一串的音节次序结合要在右脑操作，但音符组合的意义概念又必须回到左脑检出才能决定行动。左右左三步刚好 0.3 秒；而汉字字符在大脑两页均有反应，只需 0.1 秒。

2. 特殊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中华传统思想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从中国《前汉书》中，找到“有黑气大如钱 居日中央”，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黑子文字记录(李约瑟, 1978, 637 页)，比其他民族早 900 年已知道太阳上有黑子活动。

《前汉书》的更完整的文字记录：“黑大风起 天无云 日光晦、、成帝河平元年 正月 壬寅朔、、日出赤 二月癸未 日朝赤 且入又赤 夜月赤 甲申 日出 赤如血 三月乙未 日出黄 有黑气大如钱 居日中央”。

笔者与中国学者对这段文字的仔细分析，认为它已经揭示了华夏人能够看到太阳黑子的自然条件。中华大地上的黄土有 2,000,000 年长久的历史，它更是北半球一个很独特的自然现象。黑风、怪风、妖风、霾风、黄风，甚至泥雨等描述，都是古人对黄土风沙的不同形容和写实。连续多月的黄土风沙使太阳减光变红变赤，月亮亦呈现赤红，古人就容易在红太阳日面上发现了黑子现象。

在 7,000 年前人类还未有文字、更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条件下，华夏子孙就在黄土风沙的天然减光(杨伟国 等, 1997, 65-67 页)作用下，肉眼就可清楚地看到太阳上的大黑子活动。日食而现出漂亮的日冕和日面上的大黑斑，古人把左右横伸拱托的日冕形容为双鸟朝阳，红太阳上有一大片黑斑(中华后人更进一步把它形容为居住在日中的神鸟——三足金乌鸦)，两者一并刻描在硬骨板上，把这历史见证作为一块崇高的艺术品，数代都悬挂在胸前。在河姆渡还出土了相似的另外一件双鸟负日的骨板雕刻。

3. 汉字中形象信息有多层次的“象”

自然环境使黄土地华夏子民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原始思维首先要反映在最古老的科学探索上。

一个现在已不常用、但极不寻常的“𠂔”字引起了笔者反复的深刻思考，这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了。笔者在《说文解字注》第七篇“月”部中找到：月、朔、𠂔、霸、朗、朏、期、朏

等字(段玉裁, 1955, 316-317 页), 有关满月的“望”字竟被放在“亡”部(“朝”字亦不在月部), 这几个汉字都是针对不同月相和所在时刻的描述。朔、朏、霸、朏、朏等都是对新月或残月的陈述, 朏、霸更是差不多的同义字。

月龄初一是肯定不见月亮的, 初一之前、后(初二)也不一定可以见到月亮。从天文现象来分析: 只有月龄初三的月亮才是**肯定可见**的时刻。而一个“朏”字正是此刻的专用术语。古人从不可预见的月相, 反推肯定的“朏”现象。直到周代, 这“朏”仍曾被定为月之首日。“朏”=“初三”, 只是在周代以后的一个新理解。中华古人竟在 3,500 年前已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并非原始思维中的一种幼稚表现。南方夏族古人对这些自然界出现的微妙信息、偶然信息、特殊信息、交流信息、图像信息产生了独特的思考(杨伟国, 1998, 59-64 页)。

笔者更深深地思考和斟酌古人这一突破, 难道只有 3,500 年这么短吗?

华夏古人不单定义了“朏”的信息, 更从月亮在各时段“朏”的星空区域, 详细描绘出来——信息背后的另一信息, 这是天文观察上多么高水平的决策。在满月“望”时人们难以得见天上的星星。一年之内约有十二个“朏”的时刻, 不同时段星空繁星, 构成了传世的十二地支符号。每一片甲骨文中都有这 22 个字符的出现。若对天文有些了解, “子”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个极完美的“猎户座”构型。代表着夏族的“参星”, 衍化而来的“子”居十二支之首, 证明最先使用这套系统应该是夏人。

郑文光根据天文岁差的科学计算(郑文光, 1979), “子”参宿一(猎户座 ζ)现时的赤经与古代赤经的差距是 3 时 20 分(3^h20^m), 参为古代夏族的“大辰”, “子”为春分时应在公元前 2100 年, 经数百年的天文岁差推移之后, 商代的春分时刻, “大火”星成为商族的“大辰”, 这完全合乎天文星体运动的计算结果。

天干地支是中华传统文化极为奇妙的一个系统, 出土的甲骨文就有一套完整的干支表, 学者估计这只是训导初刻者的练习骨片。

闻一多早就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成数——三十六, 七十二。为什么这两个数一直贯穿各个中华学术派别的学术思想(闻一多 等, 1994, 170-181 页), 甚至于整个华夏历史? 研究古天文的中国学者与西南彝族学者一起解开了这一个大奥秘。

现居于云南一带的彝族是古代羌戎族的后代, 他们曾流行一种一年有十个时段的日历——“月”历(陈久金 等, 1984), 一年五季、每季两“月”、分雌雄月、每月卅六日、每季七十二日, 所以一年有 360 日、另有 5-6 日为过年日。这个“月”跟月亮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完全的太阳历, 传统思维中的阴阳、雌雄、五行关系在这日历中清楚地表示了出来。36、72 亦是其中重要的成数, 原始夏族历法中的卅个节气、上元、下元等多种描述亦获得清晰的解答。

在《夏小正》、《幼官篇》和多部古代有关北斗柄的指向确定月份的细致研究中, 清楚地说明夏代是使用过一种一年只有十个“时段”的日历, 而这种历法与发掘出来的十“月”历极为吻合。

夏禹亦有被称为戎禹。彝族学者认为夏文化与彝文化有深厚关系。有不少学者早就指出, 虽然《夏小正》等有关夏文明的文献是后人孔子等整理而成的, 并非夏人的著作, 但是它的确反映了一些夏文明的真实情况。例如, 在《夏小正》中就有“南门”星的描述, 这一颗星是

在南纬 -60° ，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北方族群是不可能看到这一颗星的。只有曾经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古人，他们才能有所认识。所以，夏族应不是黄河的土著民族，只是因故而迁徙到北方来。

4. 方块字与华夏口语的历史关系

更有学者多次表示：天干地支的古代命名有一套复杂系统，难以理解古代的含义。曾有中国知名学者认为这是由印度传入的天文知识。

而《尔雅·历书》记载“天干地支”就有一套难以理解的命名称呼：

十二支	天文之次	夏名称	月名
子	玄枵	摄提格 (提格)	监德
丑	星纪	单 阏	降入
寅	析木	执 除	青章
卯	大火	大荒落 (大荒骆)	跼踵
辰	寿星	敦 牂	开明
巳	鹑尾	协 洽 (叶洽)	长列
午	鹑火	涓 滩	大音
未	鹑首	作 噩 (作鄂)	长王
申	实沉	淹 茂 (阍茂)	天睢
酉	大梁	大渊献	大章
戌	降娄	困 敦	天泉
亥	娵訾	赤奋若	天皓

十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岁阳	阏逢	旃蒙	柔兆	强圉	着雍	屠维	上章	重光	玄默	昭阳

殷商、周人曾经打算放弃夏族的礼制 (主要是天文历法、正朔)，但周人最后还要回复使用夏礼。《尔雅·释天》有关年岁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现今大众只留有年和岁概念，不再用祀、载，“载”多在诗词歌赋中为了押韵而出现，我们亦清楚它是“年”的另一表达方式。我们对传统日历亦称为夏历或者农历，因为夏代已经使用了世界上独特的阴阳合历。

通过中华古文明中的玉文化、三足鼎器、饕餮神征、丝文化、稻种植、水井技术、多音语言等方面考据，学者论证认为古夏民族应是六、七千年前的江浙河姆渡—良渚一带的古越族文明的后代(董楚平, 1988)(陈剩勇, 1994)，因 5,500 年前的一次极为严重的海侵反灌，不是河水泛滥，因而散布各地。

《孟子》篇清楚说出夏禹大水“水逆行”。大水不是惯常由西泛来的江河水，倒是由东流向西，只有海水的倒灌—海侵。它迫使古越夏人弃家内迁散布各地，使河姆渡、良渚文化

被终断了几千年。古夏民族(夷)分散至东北、西北、东南等地，其丰盛的文化成就被其他部族充分吸收发扬。

曾经有夏族居停过的地方都留有夏语言痕迹，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另外唯一记录了古越人语言的《越人歌》，是春秋时代楚国令尹请人用汉字语音记录保存下来的数据。近年有学者，把这越人歌与西南壮侗语进行语言科学上的比较，首先根据音韵学家对汉字的上古音拟标出每个汉字的中古（隋唐）和上古（周秦）音，然后与壮语词逐个对照，得到古越语与壮侗语言有相同语源关系的结论（陈国强，1985，31-38 页）。

但是，夏族的多音语言，民族学家林惠祥对此多音言语称为“胶着语”（林惠祥，1996，114 页），它竟敌不过中原其他部族单音言语的历史洗礼。追查林惠祥引用罗香林的文章，罗香对古越方言有更详细的研究（罗香林，1933；1940）。他分析了语言源流、古越音记录、复辅音与连音痕迹、词式倒置等特点。就在夏族与其他商、周族群 400 年中的斗争、融合过程中，虽然夏文化大部份被继承，但夏族胶着语却退变成成为一种方言，或者作为一种语言化石留存在一音一义的汉语言中。因为夏语言与日后中原语言有明显的差异，无法在文物中再找到更为准确的语言记录——文字，尽管不少学者渴望能在历史上再往上溯探黄帝尧舜的真实性，但估计极难实现。

正因为古夏族已经散布于中华大地的各处，这一套符号规范竟能够沟通各地不同的口语，不同民族亦可有相近不远的把握。例如甲骨文中的“昔”字，就是一个“日”之上方或者下方，有水波纹的刻划，总之，它表示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一次重大事件，可能就是 5,500 年前海侵的历史写实（陈剩勇，1994，195 页）。

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方块汉字成为世界上一种表意文字，亦有学者称为拼形文字或者拼意文字。它没有时态，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素，以字为基本单位的文字结构，字形在历史长河中已经不断地简化、提炼，甚至原有的象形成份完全消失了。在与世界各民族交流接触的过程中，汉字不断增加了它的词汇数量，但汉字并没有因此而大量增加新字，这是其他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极大优点。

现代中国人仍能轻易读懂 800 年前宋代的著作，这是西方人极难以想象的文化客观事实。甚至于，现代西方的文化人日常出差和旅行，他们提包中都有随身字典。华人世界的字典，都只会存放在书架上（小学生亦会因要求而带字典上学）。

5. 现化中华语言中的古夏语言化石

5,000 年前，背负着有较优秀古越文明的夏族人，虽然广布中华大地，新移民肯定会与原居民有争斗的。夏族新移民较集中居于现今山西南、河南北部一带，以“河、洛”为核心，4,000 年前建立后来的夏王朝。

现今的汉字语言是以古黄河一带殷、周民族的一音一义语音为基础，但是他们完全接受了古夏越族的象形记事符号为语音载体，发展出一套极为独特的东方文字系统。古夏言语退却在流行语言外，只是作为一种语言化石保留在中华语言内的一些残留物，我们要花极大力气，小心地才可发掘出来。但是，这种语言化石极珍贵地、极深刻地、极长远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著名广东学者罗香林教授 80 多年前已有详尽的研究。夏言语中对人的称谓是把尊称在前，名字在后（历史上的后羿、帝昌、胡人安禄山、广东人称阿某阿贵等等，都是对男性的尊称）。在 911 事件后，美国发表的通缉名单中，字头多有 Al., Ar., An., Ab., Ap., 等等，它们就是鞑靼人安、阿的音转，这是古夏人对男性的尊称，夏的言语化石的一种重要痕迹。

而且古夏言语文法的倒装结构亦有独特之处；古夏言语更有明显的多音节口语，其中的小部份仍然可见在南方的地区方言中。

夏族定居河洛后，自此古夏民族自称为“河洛”人。

现今广东、福建一带说的“鹤佬”语，“鹤佬”两字就是上古语“河洛”的音转。笔者就是海丰“鹤佬”人，我们的“男”字读作“打甫”，“女”字读作“乍姆”，“盲”字读作“斜咩”等等，仍然保留着夏族古风。台湾吕秀莲曾说过：台语（即“闽南话”、亦是“鹤佬”语一支）要比现今“普通话”更为远祖。她曾要求把台语定为“国”语。

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音一义的“汉”语言，在过去的 3,500 历史中，亦曾遭受到另外两次，来自周边民族拼音语言的重大冲击——蒙古族和满族的先后进主中原。但是，大地上的汉语只是不断地丰富起来，一音一义的方块字特点就是一直屹立不倒。

独特的汉字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信息科技急速发展下，它的命运如何估计，必须从汉字所携带的特有的信息层次来考察，才可能更准确理解到汉字的真正价值。

6. 小结

笔者觉得要对汉字作深入的考究，必须清楚地了解整体华夏文字和语言的全部发展历史。

1987 年安子介先生出版《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一书后，他与多人一起为汉字的前途进行了大力的呼吁。引起了中、外学者认真的思考，英国学者更认为，汉字是未来人 / 机对话的首选语言，国内有学者开始作了些认真的探索。朱邦复已把汉字基因（朱邦复，1998）用到计算机上，把汉字作为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计算机语言，可以比英语指令减少了相当大的部份。科学家认为汉字可能成为计算机的一种较理想的自然语言（韩英铎 董名垂，1999，C1 版）。2002 年年底，香港文化传讯集团公布了成功开发出全球第一颗专为 Linux 开发的中文单晶芯片（香港《文汇报》，2002，A14 版），配合中文 2000 Linux/IA-OS 操作系统，摆脱了过去的间接汉化，而形成的高成本、慢速度等诸多问题。

现代神经科学、脑科学、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对研究人类思维产生的过程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科学家既然发现了有一个闲置的右脑，如何能提高未来人的智力，适应新社会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心理学者和未来教育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究竟方块汉字在信息新世纪，能否另创一番新生命，有待中华学子的努力去解答汉字的谜。

参考文献：

1.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 瑞福有限公司,1987 年
2. 陈久金 卢央[彝] 刘尧汉[彝],《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3. 陈国强,百越民族,《科学 杂志》,32 卷 2 期,1985 年,第 31-38 页
4. 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1994 年
5.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6. 段玉裁 撰,《说文解字注》,艺文印书馆印行,1955 年
7. 高定国 郭可教,对汉字认知与大脑半球关系研究的一些回顾,《心理学报》,16 卷 6 期,1993 年,363-368 页
8. 郭可教,汉字与大脑,《科学 杂志》,1985 年 1 月,17-24 页
9. 郭可教,汉字与大脑,安子介 郭可敬 等著,《汉字科学的新发展》,香港 瑞福有限公司,1992 年,42 页
10. 郭可教 杨奇志,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1995 年 27 卷 1 期,78-83 页
11. [英] 李约瑟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 四卷 天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 年 6 月,港一版,637 页
12. 韩英铎 董名垂,汉字基因论及在信息时代将引发的革命,《计算机世界》,1999 年 7 月 28 日 28 期, C1 版
13.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 年,北京 2 次印刷
14. 罗香林,古代越族考 上篇,《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 月刊》,民国 22 年(1933),一卷二期,31-42 页
15. 罗香林,古代越族方言考,《广东文物》,中国文化协进会,民国 29 年(1940)
16. 闻一多 等,“七十二”,《闻一多全集(10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170-181 页
17. 香港《文汇报》,“日本专家证实汉字具有优势”,1996,1,11,A4
18. 香港《文汇报》,“全球第一颗中文 Linux 单芯片诞生”,2002,12,17,A13
19. 许世彤 等,在汉字辨认上大脑两半球的功能特点,中国语文 - 认知科学 第五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选编,科学出版社,1992 年
20. 杨伟国、徐振韬,黄土风砂是天然特大的太阳滤镜,《93'香港天文学术论文集(IV)》香港天文学会出版,1997 年 9 月 第 65-67 页
21. 杨伟国,从信息角度看古天文对华夏思维的影响,《古天文与中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刊 (特刊),1998 年,59-64 页
22.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 年
23. 朱邦复,《智能学九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年